

义利之间

——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

YiLiZhiJian
JinDaiSHangRenYuMinZuZhuYiYunDong

◆周石峰 /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义利之间

——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

YiLiZhiJian
JinDaiSHangRenYuMinZuZhuYiYunDong

◆周石峰 /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China Modern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义利之间：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周石峰著.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4

ISBN 978 - 7 - 80169 - 957 - 2

I. 义… II. 周… III. 历史 - 研究 - 近代中国 IV. K8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246 号

义
利
之
间
：
近
代
商
人
与
民
族
主
义
运
动

周
石
峰
著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320825(发行部) (010)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4.75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38.00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69 - 957 - 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金 普 森

周石峰在其新著《义利之间：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即将面世之际，请我作序，而我早已答应：“凡我指导的学生，倘有新作付梓，送我先读为快，并愿作序。”既已允诺在先，自然无可推却！

2000年国庆节，经贵州省社科院熊宗仁研究员介绍和推荐，周石峰不远千里，从贵阳来杭州找到我，表达了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的愿望。从交谈中得知，他硕士研究生期间主要关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但对社会经济史亦有较大兴趣。既注重专业基础的深造厚植，又着力前沿知识的广泛涉猎，这是我对他的初步印象，因而欣然同意他报考。几经波折，他于2002年如愿考入浙江大学，我成为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

石峰聪慧好学，自步入近世社会经济史这一领域，潜心钻研，争结硕果，先后刊发了《马寅初的统制经济学说及其历史语境》（载《福建论坛》，2004年第3期）、《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南京十年时期津沪商人罢市之特征与成因》（载《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国货年运动与社会观念》（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等多篇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

近代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究竟何以自处？此一问题向为海内外治中国近世之史者所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论者要么认为商民族情感全然缺失而视其为纯粹的“经济人”，要么论定商人是中国现代化的功臣而忽视其逐利的职业特征，要么在肯定其民族情感的同时又责难其逐利的本性。凡此种种，或各走极端而失其客观，或秉持二分法而貌似公允，实则无益于真正体悟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言论作为。有鉴于此，我指导的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曾提出过“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思想，用来讨论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之关系，而石峰的论文以商民族情感与利益考量的交互作用为立论基础，以上海、天津两地为中

心，对南京十年时期商人因应民族危机之道作出了全新的审视。他认为，商人民族主义乃是真实性的历史存在。面对民族危机，商人的国民身份顿时凸显，其反应与学生、工人大同而小异，同属民众民族主义这一层面，而其草根性特征，也决定了商人民族主义与政府的对外政策之间，趋同与离异并存不悖。但作为近代中国民众民族主义主要表达方式之一的经济绝交运动，却往往导致商人独自承担民族久远的历史责任，因而其中的冲突紧张亦在所难免。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这些结论建立在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不仅新意迭出，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得到了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的充分肯定。

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认为：“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把近代津沪商人群体放在民族冲突和民族运动的背景之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与论析，选题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论文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思路清晰，个案分析扎实，表现了作者较强的研究能力。论文对近代商人的牟利意识与民族情感相互关系的剖析，以及对津沪商人与商会互动关系的论述，还有对商人作为‘社会人’的分析，均有独到之处，富有新意和说服力。文中注重考察商人现象的历史语境，增加了论文的力度。这是一篇较好的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的高力克教授亦完全赞同论文将民族主义运动的商人分为“人——商人——中国人”三重境界的叙述框架。我完全赞成这些专家对论文的评价。石峰历时三载，吸取答辩委员会诸位教授的宝贵意见，下了一番苦功夫，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付梓出版。我为他学术上的进步感到欣喜。在此，我衷心祝贺本书的出版！

毕业之后，石峰回到贵州师范大学工作，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作为一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他已经迈出坚实可喜的一步。相信他会在云贵高原这块奇妙的土地上经受人生风雨的洗礼，茁壮成长。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问世！

2008年春于
杭州颐景园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一、问题的提出 (1)
- 二、概念的厘定 (2)
- 三、文献回顾 (4)
- 四、立论基础 (8)
- 五、方法与史料 (12)

第二章 商人与“济案”反日 / (16)

- 一、济商的因应之道 (18)
- 二、沪商与“济案” (26)
- 三、津商与反日会之冲突 (43)
- 四、京商与反日会之冲突 (53)
- 五、抵制日货的经济效果 (61)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沪津商人 / (77)

- 一、反对直接交涉 (77)
- 二、沪商与马占山抗日 (84)
- 三、沪商与经济绝交运动 (88)
- 四、津商与经济绝交运动 (106)

第四章 沪津商人与淞沪抗战 / (118)

- 一、沪商与“双面方针” (118)
- 二、商人与“国联制日” (120)
- 三、津沪商人与党争内战 (124)

四、上海商人与淞沪抗战	(129)
五、天津商人与淞沪抗战	(148)
六、商业广告与民族主义	(156)

第五章 津沪商人与华北危局 / (163)

一、天津商人与华北危局	(163)
二、上海商人与华北危局	(172)
三、经济困境、政治生态与商人民族主义	(179)

第六章 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 / (195)

一、抵制日货的经济效力	(195)
二、抵制日货与产业发展	(199)
三、抵制日货的地域差异	(207)
四、抵制日货的政治效果	(212)

第七章 商人民族主义：想象抑或历史 / (222)

一、民族主义：多重维度	(222)
二、从抵制日货到提倡国货：可能与不可能	(223)
三、近世商人：“经济人”抑或“社会人”	(224)

主要参考文献 / (227)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网络空间充斥着抵制日货的呼声与民族主义的讨论，有论者甚至直斥网络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摇篮。实际上，此种情景在近代中国曾经反复出现，并且不仅仅是一种呼声，而多演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历史行动。与当今虚拟空间的民众诉求相比较，近代的抵制外货运动更为成功，影响也更为重大。当然，时空背景已全然不同。但是，尽管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不过适度的现实关怀亦为势所必然。因此，在民族国家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单位和民族主义依然是世界最主要议题之一的当下，重新检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则自有其意义。

学界检视民族主义，多以思想史的路径来关注精英人物，而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言论作为，则往往旁落于有关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而即便是重视民众民族主义者，亦多以清末民初为中心，尤以其中的学运、工运为重心，如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无疑是学界长期以来尤为关注的议题。青年学生因其特有的对时政的敏锐感受力以及党政力量的居间鼓动运用，在近代的诸多社会运动中都极为活跃。但是，因外力刺激而起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对商人这一群体的冲击更大，同时商界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因而商人的活动也相当频繁。尤为重要的是，商人秉有的社会资源无疑比学生丰厚得多，因而其言论作为的社会影响力也往往更为显著。

清末民初的商人民族主义无疑值得着力研究，但南京十年时期亦不应忽视。南京十年时期的近代中国，政治格局与经济态势均已发生诸多重大变化。尽管南京政府面临多重挑战，但其社会控制力无疑较诸前的北洋政权更为强大，其政治合法性亦逐渐增强。经济发展虽然已与所谓的黄金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有着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在南京政权努力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之时，内忧外患的困境仍然是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日本的不断强行侵入时时主宰着当局的政治外交乃至国人的日常生活。

日本不断制造事端，而南京政权囿于中日国力不均衡性的考量，始终把国内统一置于抵御外侮之上，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往往压倒了其“御外”的一

面,“安内攘外”的妥协退让政策成为南京政府较长时期的基本国策。而在此期间,已被动员起来的各界民众的反日运动则此起彼伏,或鼓吹政府对日强硬交涉,或诉求对日战争,或施行经济绝交,对政府对日政策或趋同而作坚强后盾,或离异而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在此一波又一波的民众反日运动中,商人究竟有何表现?他们完全认同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吗?他们与其他各界人士的表现是否一样,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原因究竟何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商人表现是否一致?“事件”中心地与边缘地的空间差异会导致商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吗?与政治中心的远近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商人的言论和作为?经济绝交之意义主要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似乎都不无重新深入审视的必要。

二、概念的厘定

本文既以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商人作为考察的核心对象,则不能不对商人与民族主义进行界说。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囊括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之经营者。但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非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着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不同。明清时期径直使用“商人”称谓,清末民初乃至其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或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此类分析工具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①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尤其是“资产阶级”一词,外延甚广,有时甚至将知识分子、党人、军人乃至学生等纳入其中,而这些群体与商人之旨趣显然有同有异,因而“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并不完全适宜用来分析商人群体。

晚近数十年以来,部分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称商人群体,如“早期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等。此类修正无疑值得肯定,但其本质仍未逃逸“资产阶级”的分析框架。笔者当然并非否认研究者完全不能使用新的分析工具,不过“价值无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旨,即便仅仅是一种理想而难以达致,但仍得努力趋近之。实际上,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称谓,或者其自身所使用的名称,^②而不宜使用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词语。

在笔者看来,近代“商人”并非单指买卖人的狭义概念,而是一广义称谓。在近代,除了将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人称为贸易商、栈商、金融商、证券商之

^① 白吉尔即曾强调将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人为性”。[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② 笔者在研阅有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近代商人的自称多为“商民”一词。

外，还将从事制造、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人称为制造商、生产商、运输商等。换言之，凡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几乎都被称为商人。不仅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习俗如此，且在法律上亦有此种广义的商人界定。例如北京政府1914年3月颁布的“商人通例”，则明确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的范围则涉及如下近20种类型：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贍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业、堆栈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①

因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所称的近代商人，是广义上的商人，而非单指狭义的买卖人。而所谓商界，实际上也是指整个实业界。实际上，即使是在今天，此种广义的商人概念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和范围内沿用，如所谓下海经商，即不仅仅指从事商业买卖，也包括从事实业活动。^②

民族主义堪称近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力量之一。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声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③ 尽管民族主义是目前中外学者正在广泛讨论的问题，但迄今尚无能够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定义，因为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民族主义的所有特征和内涵。《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民族主义定义为“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④ 但把民族主义仅仅视为一种心理状态显然是片面的，民族主义并不单指民族情感，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因此美国学者劳伦斯·卡普兰把民族主义归结为“一种政治信仰，即人民把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效忠对象”。^⑤ 而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厄内斯特·盖尔纳之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也因其显而易见的缺陷而仍然不能使人满意。^⑥

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在谈到“民族是什么”时说道：“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⑦ 就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而言，白哲特的话同样适用。笔者倾向于认同美国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卡尔顿·海斯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应有四层含义：一是指各民族建立政治实体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二是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体现的理

① 张士杰编：《商人宝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25页；陶汇曾编：《商人通例释义》，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3页；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书店1933年版，第14～25页。

② 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 [英]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④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6），第6页。

⑤ Awrance S. Kaplan, “Nationalism”, 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8, Vol. 2, p. 610.

⑥ [英]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⑦ 转见徐波：《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该文收入盖尔纳《民主与民族主义》一书，作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的代序。

论、原则和理想；三是指政治集团追求民族国家的行动；四是指民族成员的心理状态，即表现出对民族国家超越一切的高度忠诚和对本民族优越性的坚定信仰。

国家与故土自古以来就受到热爱，此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不尽相同。前者是近代特有的现象，它起源于把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忠诚的对象，是“民族和爱国主义两个极其古老的现象在近代感情上的融合和膨胀”，^①因而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才出现的。

民族主义作为18世纪以来最具普遍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打下了自己的印迹。就政治层面而言，民族主义最集中的表现是反对外来压迫和对民族国家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过程往往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加以完成；就文化层面而言，民族主义则表现为认同、维护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抵制外来不良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就经济层面而言，则表现在发展民族经济，建立统一市场，反对外来力量对本国经济资源的剥削和掠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主要有三种取向：一是民族国家的创立。在这一取向之下，民族主义得以产生和传播的背景或是反对神权和王权，建立全民国家，如英国和法国；或是反抗外来压迫，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平等，如早期的美国和“一战”后的亚洲国家。二是对民族国家声望的追求。如战后东亚国家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以求通过经济的成功，实现国家的富强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三是对外扩张。这是民族主义极度膨胀的结果，19世纪的殖民主义、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均是这种取向的典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兼具前两种取向。

三、文献回顾

中外治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思想之史者，几乎无不提及民族主义。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nationalism）是一不断重申的主题，而且民族主义浪潮处在“不断高涨”的进程之中。细察诸多关于中国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不难窥见：初始，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事件之动力，而到结尾时民族主义又多因这些事件而进一步“上升”。民族主义一身而兼为历史发展之原因与结果，其受到史家的重视可见一斑。

可以说，作为一诠释工具，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中运用得相当广泛，甚至不乏滥用之例。^②但如果检索相关文献，便会发现此一备受重视并被广泛使用

^① 转引自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 Arthur Waldron, "The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World Politics, 37 (April 1985), pp. 416~33. 18.

的中国民族主义，专门的研究论文已为数不多，而专题著作则更是屈指可数。^①一般而言，只有已达成基本共识者或根本不重要之论题方会出现如此现象。而细检诸家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议论，实歧见纷纭，恰最缺乏一致认识。其唯一共识，或许在于论者均承认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何以出现此种诡论性的现象？原因必多，但其中一种可能或许是，论者都以为此一问题本已达成共识，故再无深入研究之需要，于是人人皆视民族主义为现成工具，信手拈来，似乎颇为得心应手。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专题著作都不过是晚近十年才出现，此亦颇能说明一般论著中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未必尽是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故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关于近代民族主义之表面共识亦不啻为一充满想象之迷思（myth）。^②

尤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思想史路径，决定了考察对象多局限于精英人物的思想言论，但广义言之，民族主义委实不单单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主义”，它“不仅仅是社会变迁的附产物……不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原因、表达、甚而其动力，它就是社会变迁本身”。^③因此，考察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运动当中的言论与作为，即与探讨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一般民众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④

近代中国商人已从四民之末转而跃升至四民之首，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日益高涨，并且组织化程度远比一般民众要高得多，因而在历次民族主义运动中表现极为活跃。近代中国商人之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却极为迅速，几有蔚成显学之

① 据笔者所知，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进行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载《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73页。

③ Geertz,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Fate of Nationalism in the New States”, pp. 251~252.

④ 在民众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方面，王立新探讨了20世纪初期抵制美货运动中民众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指出在此运动中，民众已经能够从理性民族主义的角度，依据近代西方理性精神中的人类基本正义观念，运用现代传媒维护国家和自身利益，从而体现了不同于排外民族主义运动的特色。见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1~33页；张鸣则对近代“乡村民族主义”进行了概要式的考察，认为乡民这一近代中国重要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入侵，民众“天下观”动摇以及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而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种情绪和思潮之间的中间形态，比之后来新型的精英的民族主义，带有更多的非理性成分和乡土色彩，换言之，它存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意识趋向”。见张鸣：《近代“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新“十字军”东侵》，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96~101页。

势,无论是研究主题、理论框架还是时空的选择上,均取得了重大的突破。^①但令人颇为遗憾的是,研究时段极不均匀,有关成果主要集中分布于清末民初,特别是关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五卅运动中的商人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文献。比较而言,1927年以后的商人研究则显得极为薄弱。如白吉尔所撰《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一书,虽然把考察的时段延伸到了1937年,但其研究的重点仍在民初,南京十年时期的商人研究,则仅以“尾篇”的形式出现。^②其原因或许在于,一般认为国民党上台之后,商人受到政权的过度压制,而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③用白吉尔的话来说就是,“官僚体制的卷土重来与资产阶级走向衰亡”。^④

1980年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商人的身份被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种种概念所遮蔽,学界的研究亦不过是为“革命”寻找历史的合法性而已。1980年以后,中国近代商人的研究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部分学者试图对以往批判为主的讨论模式进行纠偏,从而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力求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不过,讨论的时段主要集中在九一八事变与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商人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抗日动向等,无疑是最为常见的论题。肯定其民族主义情感时,又否定其抗日活动的主动性,基本上没有脱离二分法的思维模式。^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人研究成为一大热点。但在纠正以往“泛政治化”倾向之弊时,又陷入了“去政治化”的泥坑,如过分强调商会的经济功能即为一显例。^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学者从中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⑦亦有学者对济南事件之后的民众反日运动进

① 有关近代商人研究的大致状况,可以参阅应莉霞:《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4~113页;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研究》,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第87~98页;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61~166页。

②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30页。

③ 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研究》,第87~98页。

④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309~330页。

⑤ 可参阅曹必宏:《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载《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第105~110页;朱华:《一二八战争期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转变》,载《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2期,第60~66页;朱华:《一二八战争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44~51页;张义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载《史林》,1992年第1期,第13~16页;陈麟辉:《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动向》,载《上海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69~74页等。

⑥ 如宋美云对天津商会的通论式研究中,竟全然未有涉及此一组织在历次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表现。可参阅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⑦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

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①

但总体而言,在民众与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主题上,国内的研究很不尽如人意。相反,海外学者倒非常关注这一议题,一批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台湾乐炳南之博士毕业论文以“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为题,专列一章叙述了“济案”所引发的中国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对此次经济绝交之意义、经过及经济效果均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文中所引相关中、日、英文资料甚丰富,但其重点还是在探讨“济案”之始末。^② 韩国学者裴京汉则强调了济南惨案之后反日运动的党派背景,认为上海等地的民众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③ 如此虽有利于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性质,但相对弱化了包括商人在内的民众反日之主动性。

美国著名的民国史专家柯博文特别关注 20 世纪 30 年代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日本因素。他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极为细致地考察了自 1931 年至卢沟桥事变之间,日本因素对中国政治外交的种种关键影响。其中虽然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民众运动着墨颇多,但其主旨还是在于通过考察南京政府、地方领袖、“民意”力量三大群体在面对日本入侵时种种不尽相同的应对之道,以及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为理解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实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④

迄今研究中国近代民众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无疑当推美国学者雷麦所撰的《中国抵货运动研究》^⑤ 以及日本学者菊池贵晴所撰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构造——关于对外抵货的研究》两书。前书详细考察了自 1905~1933 年间的 9 次抵货运动,作者对每次运动的经过均有简单叙述,对其中各种参与力量的作用亦有所评价,不过作者着力之处还是在于评估各次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同时正如近人所指出的那样,该书内容方法虽均有过人之处,但其中也不无缺点,如书中引用海关日货输入数字,标准未尽一致,有总数和净数之别,而对台湾一地,时有列入而时又未能列入,如此则夸大了日货输入的跌落趋势。^⑥

① 周斌:《1928 至 1929 年的反日会》,载《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145~185 页。

② 乐炳南:《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1927~1929)》,台北国史馆 1988 年版,第 251~311 页。

③ [韩]裴京汉:《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106~114 页。

④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⑤ C. 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G PRESS, 1933. 本文参见版本为台湾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Taiwan, 1966 年版。

⑥ 陈正谟:《九一八后中国排斥日货之检讨》,载《经济学季刊》,第 6 卷第 1 期,中国经济学社出版社 1935 年版,第 70 页。

后书为菊池贵晴对中国近代对外抵货运动一连串研究的结集，讨论自清末至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民众多次重要的经济抵制运动，对象涉及了美国、日本、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也讨论了每次抵货运动的阶级构成。笔者认为，这些运动反映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民主主义运动的成长过程。笔者亦高度评价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本书所用资料来源广泛，并不仅限于中国，也包括日本方面及欧美方面的资料。对各次运动的具体经过及背景的细致分析，更能从社会经济的侧面对近现代中国民族运动作出一番实证的解释工作。^① 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在于全面考察了历次抵货运动，对商人的主动性及其作用评价颇高，但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抵制一项。

尽管在商人民族主义这一研究领域，海内外取得了若干成果，但与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仍然极不相称。我们自然可以追问：逐利的商人，其民族主义情感能否被否定或贬视？与学生、工人等相比，商人民族主义有无特异性？与南京政府的温和甚至妥协的对日政策之间有何异同？商人这一群体的内部，是分歧冲突还是谐和一致？地处不同城市的商人面对同一事件，反映是否一致？如果存在着地域差异，其原因又何在？等等。

四、立论基础

革命史框架曾经一度主宰了内地的近代商人研究。把商人的言行与“革命者”的主义与信仰相比照，并以此作为判评商人的唯一准则，既有难圆其说的理论缺陷，又与历史真实多有不合，因此革命史框架因其固有的弊端与不合时宜而相继被种种时新的理论范式所取代，实为正常的学术研究之新陈代谢。

1980年以后，部分学者开始引进现代化理论作为近代中国史的诠释范式，试图把中国近现代史重构为一部现代化史。此一尝试虽不无学术创新的意义，但是现代化架构下之商人，则无一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功臣或失败之担当者。部分功成名就的大商人或许不无“实业救国”之想，但多数商人无非是为求锱铢薄利而资生计的普通民众罢了。更为重要的是，部分研究显然是把丰富的历史史料生硬地强行塞进此一框架之中。1990年，又有部分学者利用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商人，然而此一流源自西方历史情景的理论范式，究竟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具有多大的解释力，学界亦不无疑问与争鸣。况且此种新的研究视角，亦未根本脱离“泛政治化”的评价模式，其重心仍从预设的理论前提入手，如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对立，真正站在商人角度来探讨其角色与言行之著作，仍然十分罕见。^②

① [日] 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构造——关于对外抵货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4年版。

② 采用市民社会理论来研究近代中国商人的代表作当推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一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冯筱才则用“产权与秩序”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商人的“常态”与“变态”行为。他以江浙商人为考察对象,认为商人对政治的关心无非是出于对其产权是否受到损害、商业秩序是否受到波动的斤斤算计,^①但在笔者看来,这一框架实际上滑入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预设的陷阱,^②它无法解释商人的诸多情绪化的非理性行为,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恰恰是愤怒情绪与理性算计并行不悖。

笔者首先亦从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出发,来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逻辑进行探讨。史家曾一度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受激于民族主义这一社会思潮。^③实际上,截至20世纪60年代,广泛的群众不满加上震撼人心的社会思潮一直被认为是触发社会运动的主因。这种论点此后在西方受到挑战,引起研究范式的嬗变,研究者转而注重行为者的理性而非情感方面,强调社会组织而非社会思潮的动员作用。

几乎在张存武著作发表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出版了他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既有的集团理论认为,集团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它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奥尔森颠覆了这一传统观点。他从微观经济行为角度出发,把个人利益在集体行动中的支配作用推向了极致。他不但否认利他主义与其他情感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且指出共同利益(阶级或团体利益)本身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联合行动。^④因为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论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集团收益的此一性质导致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除非运动的组织者能奖善惩恶,即提供所谓“选择性的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或者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消极性的强制,或者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出力的人来进行积极诱导,否则集体行动便不可能。在抵货运动中,各抵货组织所宣布的诸多奖惩措施说明时人直观地认识到自私行为之不可避免。

但在组织中毕竟经常涉及情感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奥尔森以组织的最重要的类型——国家来进行检验。他承认,爱国主义可能是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

① 参见冯筱才博士论文,《变革社会中的商人与政治(1911~1927)——以江浙为中心》,未刊稿。

② 对西方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预设的梳理与批评,可以参阅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66页。

③ 张存武发表于1966年的《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一书堪称其中的代表作。可以参阅张存武:《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

④ 他声称,“认为从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个人在实现了集团目标后都能获利,由此也不能推出他们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即使他们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美]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页。

经济动机，许多国家利用某一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或者通过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不过在他看来，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维系以及法律规章制度的不可或缺之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依靠自愿集资或捐款来供养自己。^① 因此奥尔森虽然并未完全否定爱国主义观念因素的存在价值，但无疑认为其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奥尔森提醒我们自私行为的普遍甚至绝对性，任何解释框架都必须将之包括在其中。然而集体行动毕竟经常发生，譬如作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形式之一的抵货运动以及中外其他许多社会运动表明，人们对公益事业的热情支持和“搭便车”的做法同样普遍，集体行动理论必须同时解释上述两种现象。

随着经济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说日益受到质疑与批评，^② 从而为“新理性经济人”学说所取代。在“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中，“个人利益”不再仅仅是货币收入、物质享受等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明确地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关键概念的广义解释，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逐步向除了市场之外的非市场领域拓展成为可能。^③

“利益”概念内涵的扩充，无疑增强了经济学理论对其他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但是对集体行动的复杂性似乎还难以做出周延的阐述。王冠华指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比较适合于解释利益集团行为，不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运动。^④ 而张存武的研究亦提醒我们，大多数抵货运动参加者的基本动机并非是利己的，他们抗议美国排华法不是基于直接利益得失的计算，而是出于民族义愤。在国家存亡的关头和民族屈辱感的驱使下，任何国家都不乏无私奉献者。意识形态和情感在社会巨变时期往往具有难以估量的感召力。

大规模民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参加者的复杂性，或称非匀质性和不对称性（heterogeneity and asymmetry）。复杂性是多方面的，参加者社会成分的复杂即决定了参加者动机与认识水平的多样性。他们中有的为社会正义、民族主义等

① [美]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12页。

② 如法国经济心理学家保罗·阿尔布认为，人除了利己的动机外，还有利他的感情，如友谊、仁慈、爱国主义、对政治或宗教事业的热爱。参阅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第160页。

③ 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堪称其中的经典之作。贝克尔坚持用经济人假设的信条，利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社科研究的课题统统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政客也罢、知识分子也罢、经商也罢，从戎也罢，独身也好、结婚也好、利己主义也好、利他主义也好，各种人的种种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即追求效用的最大。贝克尔眼中的效用，其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或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非货币因素。参见中译者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美]，加里·S. 贝克尔、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所作诠释的第5页。

④ 王冠华：《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5页。